



洪廷彥著

洪廷彥史學文存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廷彦史学文存/洪廷彦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2.3

ISBN 978 - 7 - 101 - 08502 - 0

I . 洪… II . 洪… III . 史学 - 文集 IV . 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9535 号

---

书 名 洪廷彦史学文存

著 者 洪廷彦

责任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1/4 字数 258 千字

印 数 1 - 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502 - 0

定 价 46.00 元

---

---

# 目 录

两汉三国的“夷兵” .....	1
“南方经济大发展,北方民族大融合”质疑 .....	19
三国两晋南北朝史概述 .....	30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 .....	51
再谈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 .....	58
从晋隋间的历史看文化的发展 .....	63
对《隋书·地理志》所记南北户数的初步分析 .....	70
三至六世纪的辽东和辽西 .....	81
三至六世纪的淮水南北 .....	106
魏晋南北朝淮河流域的水利和旱涝灾害 .....	127
孔子思想与历代儒家思想 .....	133
评《春秋公羊解诂》 .....	137
北朝前期之儒学 .....	149
先秦两汉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	158
魏晋南北朝的儒学 .....	165
赵岐《孟子章句》政治思想管窥 .....	172
说《梁书·止足传》 .....	178
试论杜预的“《左传》癖” .....	184

读《春秋穀梁传集解》札记 .....	198
经学史与历代政治 .....	205
封建王朝对农民有没有过让步？ .....	221
也谈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	225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 .....	241
中华民族凝聚力与精神文明建设 .....	248
关于加强夏代历史研究的建议 .....	254
如何搞好社会历史型博物馆的基本陈列 .....	259
《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的原作者究竟是谁？ .....	267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 .....	274
从成都至无锡——随师读书杂忆 .....	287
钱穆先生二三事 .....	293
怀念蒙文通老师 .....	295
缅怀岳父谷城师 .....	302
深切缅怀徐中舒先生 .....	317
沙孟海日记导读 .....	322
答洪廷彦 1963 年 3 月 .....	蒙文通 341
关于清代西北边界看法致洪廷彦函 1976 年 7 月 .....	谭其骧 345
关于火器的通讯 1979 年 .....	[英]李约瑟 348

## 两汉三国的“夷兵”<sup>①</sup>

唐长孺先生在《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一文中<sup>②</sup>，为了说明边境各族与魏晋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种族的与阶级的矛盾，曾经对魏晋统治者利用各族人民补充兵源、扩大军队的情况作了论证；并且指出：以内迁各族为兵，两汉时已然，不过到了三国时由于人口的减少，更进了一步。

本文想把这一问题从西汉谈到三国，而着重在东汉的一段，试图描述其发展情况，并探求其原因。因为我认为从问题的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看，魏晋固然是成熟阶段，但所以产生这一问题的关键应该求之于汉代，特别是后汉。所以对前一阶段作系统的叙述正和对后一阶段作详细的论证一样，都是十分必要的。

① 三国“夷兵”问题，郝经《续后汉书·八录》中曾有专条，然其文不传。两汉夷兵问题，吕思勉先生《秦汉史》（下册第 618、683 页）也曾简要地谈到。本文旨在对这一“老问题”，作一次再讨论，以明其渊源，为行文方便起见，“夷兵”一辞仍旧，读者谅之。

② 见三联书店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汉朝统治者招募各族人民为兵，可以说从高祖时已开其端<sup>①</sup>。西汉初期，诸侯王在与中央王室的斗争中，也往往借助于“北胡”、“南越”之兵力<sup>②</sup>。当时除了国内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外，民族矛盾也是存在着的，而且逐渐的较之第一种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在研究对付匈奴的政策时，晁错认为“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以利用他们的长技，从此，这一政策成为汉朝统治者对外政策的主要部分。但应该说明：晁错当时并不主张单靠“夷兵”作战，而是主张“益以边郡之良骑”，“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的<sup>③</sup>。此后，汉对外用兵，常用这种办法配备力量，但武帝以后，往往与晁错所建议的精神不相一致。在对西域的历次军事中，完全使用“诸国兵”，而不益以“郡骑”、“郡兵”的事例，不一而足。

《汉书·西域传》：“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征和四年，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天凤二年，王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人，分为数部，入焉耆。”

《汉书·郑吉传》：“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

---

① 《汉书·高祖本纪》：“北络燕人来致枭骑助汉。”《风俗通》：“高祖为汉王时，阆中范目说高祖募取賤人定三秦。……”

② 详《汉书》之《吴王濞传》、《高五王传》、《周勃传》、《江都易王传》、《匈奴传》、《两粤传》。

③ 《汉书·晁错传》。

诸国兵攻破车师。神爵中，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

到了东汉，征发“夷兵”的军事，见于纪载的不下八十次，从数量上看，要比西汉时多得多。而且大都是单靠“夷兵”出征；窦宪征北匈奴之役，是东汉一大“武功”，这一次，“夷兵”在窦宪军队中占极大比重。

班固《窦将军北征颂》：“羌戎相率，东胡争骜，不召而集，未令而喻。”<sup>①</sup>

《燕然勒石铭》：“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sup>②</sup>

就“夷兵”在东汉帝国政治上的地位而言，其重要性，也较西汉时发展了一大步。何焯以为当时治蜀的人“能抚蛮则足以制羌”<sup>③</sup>，其实，这一“要诀”，也不仅治蜀为然，凡有“夷狄”之郡，无不如此。

《后汉书·循吏·任延传》：“武威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民畏寇钞，多废田业，延到，选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赏罚，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其有警急，逆击追讨。”

中平年间，羌胡侵三辅，皇甫嵩主张发乌桓三千人，邹靖主张开募鲜卑，而应劭则主张“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多其劳赏”<sup>④</sup>。三人主张虽异，总之，都是在“夷兵”头上打主意。不仅如此，内郡发生“民变”，也得调用夷兵去镇压。延熹八年，度尚从辽远的幽冀，征调乌桓兵去对付零陵的朱盖、胡兰<sup>⑤</sup>，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① 《艺文类聚》卷六九。

② 《后汉书·窦宪传》。

③ 《义门读书记》。

④ 见《后汉书·应奉传》。

⑤ 《后汉书·度尚传》。

东汉统治者对利用“夷兵”问题，曾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人可以宋意为代表，他说：“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sup>①</sup>另外一种人如梁商则引以为忧，担心着内郡忘战日久不是办法<sup>②</sup>。“坐享大功”“忘战日久”，都说明东汉“以夷制夷”政策的执行，大殊于西汉，西汉使用“夷兵”，不是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依靠来使用，东汉时就显得非此不可了。

要了解这一发展过程，有必要谈一下两汉军队数量与质量的概况。杜佑《通典》：“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遍海内，强弱相并。”西汉在吴楚七国乱前，可说承商周之余绪，诸侯王往往夸称精兵可具数十万<sup>③</sup>，而郡县武备也很充实，内郡有材官、北边有骑士、南方更有楼船士，诸郡踵秦置都尉。景武以后，诸侯王但“衣食租税”，国内反抗势力既已削弱了，而武断于乡曲的豪强和百吏不敢前的“十贼犷弩”（公孙弘谓十贼犷弩，百吏不敢前）一时还不可能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当时帝国军队的作战对象，主要是边疆各族。这就使得主要的军队，集中在边疆（尤其是北方），而内郡之材官，用之于对外作战，效力不高，故武帝之后，往往选募勇敢、奔命、伉健……<sup>④</sup>到了东汉内地武备，则“长从募士多而郡国之兵坏

① 《后汉书·宋均传》。

② 见《后汉书·南匈奴传》。

③ 《汉书·吴王濞传》：“发书遗诸侯，书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汉书·伍被传》：“淮南王曰：今吾国虽小，胜兵可得二十万。”

④ 钱文子《补汉兵志》：“武帝之后有选募、有罪徒，其选募曰勇敢、曰奔命、曰伉健、曰豪吏、曰应募。”

矣”<sup>①</sup>，汉光武把材官罢了，而缘边十二郡的骑士，实际仍然保存<sup>②</sup>这些情况，说明了边兵独强的形势，由来有渐；这对研究两汉之际的政治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注意，幽州突骑自从落到了光武手里之后，对他的帝业起过何等重大的作用（详《后汉书》耿弇、吴汉、彭宠、景丹、马武诸传，此处不赘引），我们更当注意，光武笼络“兵马精强”的“行河西五郡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窦融，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情况的严重，当然更进了一步。西羌既是东汉主要的外敌，于是“关西诸郡，北接上党、太原、冯翊、扶风、安定，自顷以来，数与胡战，妇女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其胜可必”（郑泰的话）。而驻守在西北的将军，终于形成强大的军阀；早在梁冀的时候，李云就忧虑着“西北列将，得无解体”（见《后汉书·李云传》），后来竟发生了董卓之乱。

## 二

上文说明两点：（一）“以夷制夷”政策之执行，（二）边兵独强形势之造成与加强。由这两点，不难推知的第三点乃是：夷兵在边兵中占绝大比例，成为帝国的主要劲旅。这一点也和前面两点一样，发端于西汉，至东汉，乃成积重难返之势。《后汉书·吴汉传》：“汉说太守彭宠曰：‘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蔡邕《谏用三互法疏》

① 《补汉兵志》。

② 见《后汉书》窦宪、梁冀、班勇诸传。

“幽州突骑，为天下精兵”，这一部分天下精兵，谁是主体呢？《吴汉传》说：“汉选四部精兵黄头吴河等，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头并进。”《魏志·公孙瓒传》：“光和中，梁州贼起，发幽州突骑三千人，假瓒都督行事，传使将之。”《后汉书》之《公孙瓒传》及《刘虞传》都作乌桓突骑。可见西汉末年以来，幽州突骑一直以乌桓为主要成员，即到晋代，也是如此。《晋书·王浚传》：“迁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东海王越将迎大驾，浚遣祁弘率乌丸突骑为先驱。”

至于西北的边兵，当然以“羌胡”为主，《东观汉记》载光武与窦融书：“行河西五郡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融……率厉五郡精兵，羌胡毕集。”原来属国都尉的任务就在于“招抚羌胡”。东汉时，凉州之护羌校尉和幽州的护乌桓校尉、并州的使匈奴中郎将，其职责也在招集“夷兵”。《后汉书·段熲传》：“三年春，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人。”可知“胡骑”是军队中的常员，战事结束后不即遣散。他们在汉朝的军队中，领受“牢直”、“廪赐”，《后汉书·董卓传》：“中平六年，征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廪赐断绝。（李贤注：“《前书音义》曰：牢廪食也，古者名廪为牢。”）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这是董卓以羌胡为借口违抗朝令的话。至于郑泰对董卓所说：“今见在者，不过匈奴屠谷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悚，况小丑乎？”和蔡文姬描写董卓军队“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都足证明西北边兵之精强，而其主体实为“胡羌”。

由上，我们不难理解袁绍檄州郡文所谓“长戟百万，胡骑千群”（《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是如何的足以自豪，也不难理解曹操何以那样怕袁绍“侵扰关中乱羌胡”（《魏志·荀彧传》）。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袁绍所谓：“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

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魏志·武帝纪》）确也不是狂妄之语。当时拥有“夷兵”的军阀，显然不是“以夷制夷”，而是引“夷”对内。

三国“夷兵”的材料，唐长孺先生已列举了一些，这儿不赘。概言之，魏军多有匈奴、鲜卑、乌桓、氐、羌。蜀军多有賨、叟、青羌。吴军除以山越为最大兵源如唐先生所说外，南蛮也为兵源之一。因为当时西起巴郡，经武陵、南郡、江夏、豫章、庐江，以迄于九江，都有许多南蛮。黄琬说：“江夏大邦，蛮多士少。”（见《后汉书·黄琼传》）卢植于熹平年间曾因九江蛮反拜九江太守致“蛮寇宾服”，后“南夷反叛”又拜为庐江太守（见《后汉书》本传）。足证《北史·南蛮传》所谓：“蛮之种类在江淮之间，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巴蜀。”自东汉末年已然。如下几条材料，说明庐江为精兵产地：

《吴志·陈武传》：“策破刘勋，多得庐江人，料其精锐，乃以武为督，所向无敌。”

《吴志·刘晔传》：“刘勋为庐江太守，兵强于江淮之间。”

《魏志·曹洪传》：“洪将家兵千余人就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

虽未明显说明即是南蛮，却是很有可能的。

魏蜀竞将各族人民内迁的事实，除徙氐之举外，还有争夺巴西賨民的一场激战。《蜀志·张飞传》：“张郃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蒙头、荡石，与飞相拒五十余日……飞遂破郃。”（据《华阳国志》“宕渠为故賨国”，“李特世祖，本是巴西宕渠賨民，值天下大乱乃移入汉中”。）姜维徙凉州民夷人居蜀境，也见于《华阳国志》：“凉州胡王白虎文治载得率众降，卫将军维徙之繁县。”

不仅如此，散居于疆场之间的各族人民，往往被利用在敌国的后方做内应。如吴之武陵，与蜀为界，当地的南蛮是蜀所争取的对象。《吴志·潘濬传》注引《江表传》：“武陵部从事樊仙诱导诸夷，图以武陵属刘备。”《蜀志·先主传》：“章武元年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王基为魏筹划伐吴，也曾建议：“率合蛮夷以攻其内，精兵劲卒以讨其外。”（《魏志·王基传》）至于凉州的羌胡，自然始终是蜀所注意的力量。姜维曾谓：“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自陇以西可断而有。”<sup>①</sup>

显然，随着东汉末年以来内部政治形势的发展，战争需要较多较精的军队，“夷兵”更广泛地被引用了，在汉族内部军阀的竞战中，大家都把“夷兵”看作精锐的军队而予以特别的重视，甚至为此相竞把“夷族”徙居内地（当然两汉已有徙戎人居内地之举）。唐长孺先生认为以内徙各族为兵，在三国时期，由于人口减少而更进一步，这是问题的一面；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所在，应该从东汉以来“内郡忘战日久”的基本事实去加以分析。

### 三

东汉一代，内郡忘战日久的情况是存在的，《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鸿鹄捕鹰鹯，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应劭所感叹的，是“官无警

<sup>①</sup> 见《蜀志·姜维传》。

备”，是“王旅不振”；他所指的“寇”、“强敌”，包括三方面的势力，一为农民起义军，一为边境各族的军队，一为大土地占有者的武装、反抗王室的军阀。农民起义军在东汉末年，不仅规模大，声势浩大，而且战斗力强。《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太祖将步骑千余人行视战地，卒抵贼营，战不利，死者数百人，引还，贼寻前进，黄巾为贼久，数乘胜，兵皆精悍，太祖旧兵少，新兵不习练，举军皆惧。”黄巾精悍能战，为曹操所震惧（后来曹操把这部分黄巾编为青州兵）；即拥有西北边兵的皇甫嵩、董卓也曾为黄巾所败，所以农民起义军面对阶级敌人，在经历几次战斗的实际锻炼之后并不是“平土人脆弱”的。农民所组成的军队对长期被奴役而大举“入侵”的羌胡，却如刘陶所说：“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斗生之计。”（《后汉书·刘陶传》）他们在军阀混战中所表现的也少有勇敢善战的例子。

“官无警备”、“王旅不振”，诚如应劭所说，与汉光武罢材官骑士有关。东汉一代，征发郡兵的记载虽然还可看到，民兵的军籍也还是保存着，但是军备废弛是事实，训练不严也是事实（参考劳榦《汉代的兵制与汉简中的兵制》）。对此深表不满的，光武时已大有人在（如马武、臧宫），班固作《汉志》，有“刑法志”而无“兵志”，对军备废弛问题也提出了意见。

然则光武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以后的当政者又未能采取措施改变这一情况呢？

首先应该回答两个问题：（一）为什么不行征兵制而用募兵制？（二）既行募兵制，为什么不求数量上充实、质量上提高？

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兵农遂分，不可合一，有养军之患”（《义门读书记·后汉书记》卷一）。其实募兵初实行时，正为节省开支，减轻负担，精于挑选，提高效力。

如前所述，西汉军队的作战或防御对象，在吴楚七国乱前，主要是“诸侯王”，其后，则主要的是“夷狄”。稍有远见的政治家晁错，早在文帝之世，已感觉要加强边防，必须“募民徙塞下”，“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见《晁错传》及《食货志》）。这两项措施是被文帝采纳实行了的，在后来的对外军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晁错的议论，从秦代的历史教训和汉初的现实利弊，说明了征兵制不能适应对外作战的需要，他说：“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下，内郡之卒，守塞一岁而更，边疆有警，远县征发，不仅耗费太大，而且“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还有激起反抗的危险。

但晁错并没有否定征兵制的意义，因为他是吴楚七国乱前的人物。武帝以后，对外军事大作，谪发逐渐代替征调而兴，征调降于次要地位（参看吕思勉《秦汉史》“政治制度”“兵制”），但谪发“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晁错语），不如招募比较妥当。募兵制之产生，实在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们再从军队的装备来研究。当时军队的武器装备，已比较

讲究,《荀子·议兵篇》描写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羸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经过自秦至汉数十年之战乱(包括西汉初期诸侯王与汉王室之斗争),这种装备当然不仅魏国故土一带为然。《汉官仪》所举“五兵”,有“弓弩、戟、楯、刀剑、甲铠”(《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在这些兵器中,弩是最重要的,《汉唐事笺》卷六:“汉之兵器率以弩为尚。”其次是“长戟”,晁错曾谓:“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因为长期的与匈奴交战的结果,要对付胡骑,不仅当重视养马,而且当精造汉族善于使用的兵器,崔寔回想汉代盛世“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铠弩之利”(《政论》)。汉法并且规定弩十石以上不得出关。显然,这种兵器的制造,是颇为费钱的,后汉时财政困难,“铠则不坚,弩则不劲”(《政论》),灵帝中平元年竟至“诏公卿出马弩”了(《后汉书·灵帝纪》)。

《淮南子·兵略训》:“易则用车,险则用骑,涉水多弓,隘则用弩。”稍后,这几句话就过了时,车战日趋淘汰,骑兵和强弩不限于险隘之处始用之,它们比前一个时期(吴楚七国乱前)显得更为重要。由于武器和战术的发展变化,训练必须加强。因为要内郡的壮丁熟习骑马,是不甚简单的,而操弩的技术也需要过人的体力(见《汉书·申屠嘉传》“材官蹶张”注)。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挑选募集一批精强的兵士,予以完善的武装与严格的训练,使之能够真正担当起作战的任务,至于一般的“材官”,装备和训练不得不相对的放松了些,这在西汉中期以后,原是用较少的财力收提高军队质量之效的一个措施,较之普遍的加紧对全国壮丁的训练,普遍的改善装备,自然要省钱省力得多。

以上仅就作战对象之转移,武器、战术之发展,分析了征兵制之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从根本上摇撼征兵制的,还得从当时社会

经济的主要变革方面去考察。

汉朝自武帝以后，土地兼并在急剧的发展着，其情况之严重，可从《通典》作者杜佑的口气中听出来，他说：“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废弛，并兼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间。”杜佑是把西汉后期看作唐以前土地兼并的最高潮的。正是因为这样，限田、王田的建议与法令才不得不提出来，而最后还是阻挡不住。土地兼并的结果，出现了大土地占有者，他们“貲貲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汉书·宁成传》），拥有几百家宾客（如伏湛、马援），这种势力之发展，形成了对抗皇室的力量，《汉书·严延年传》：“涿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这是西汉中叶的事情，当时出现过打击豪强的酷吏，司马迁、班固都为他们作了专传。到了王莽时，许多大土地占有者，“买兵弩”（如吕母、樊重、刘秀）、“拥众保营”、“作营堑”（见《冯纺传》及《郭伋传》），成为强大的武装，代替西汉中央政权而继起的新的王室，就是出身于这种豪族。

由上，可以想见，皇权与“豪大家”之间，存在着的激烈的斗争，包括着争夺土地、劳动力（这也是兵源）。材官、楼船士散在各郡各县，在强宗豪族势力强大的情况下，不仅不能引为巩固皇权的工具，反有被豪族操纵之危险。翟义反对王莽，就是利用都试时起事的（事见《汉书·翟方进传》），光武兄弟之起兵，也曾计划如此做（详见《后汉书·李通传》），只因计谋泄露，才提前发动。何焯认为建武七年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之诏，“盖恐州郡各有兵众，复将因以为资”（《义门读书记·后汉书记》卷一），是正确的。因为皇帝既有了强大的边兵和募士，内郡的常备兵留之恐为反对势力所用，不如去之。

从财政方面看，既然皇权与豪族之间争夺着土地和劳动力，豪